

A Study on Bridgma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an Zi 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

ZHENG Jiani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ne 28, 2025

Accepted: July 13,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ZHENG Jiani. (2025). A Study on Bridgma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an Zi 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151–15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19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19>

Abstract: According to André Alphons Lefevere's theory of rewriting,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process of linguistic conversion, but a form of rewriting shaped by three major factors: ideology, patronage, and poetics. Therefore, 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linguistic transfer, but also examine how translated texts maintain or challenge the prevailing ideological and poetic n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rewrote *San Zi J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patronage, and poetics, in order to reveal how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percep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were both received and reconstructed. This study further aim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rewriting in the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San Zi Jing*.

Keywords: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San Zi Jing*; Rewriting Theory; Chinese Primer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eng Jiani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from Ningbo University, with a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Her email address is 1838259926@qq.com.

改寫理論視域下裨治文的《三字經》英譯研究

鄭佳妮

寧波大學

摘要: 安德烈·勒菲弗爾 (André Alphons Lefevere) 的改寫理論認為, 翻譯並非單純的語言轉換過程, 而是一種受意識形態、贊助人以及詩學三方面影響的改寫行為。因此, 翻譯研究需兼顧語言轉換與上述三大要素, 重點考察翻

譯文本如何維護或顛覆既有的意識形態和詩學。本文擬從改寫理論角度，探討裨治文如何在意識形態、詩學及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下改寫《三字經》，以此來揭示 19 世紀西方對中國文化的接受與重構，並進一步加深對《三字經》跨文化傳播中改寫現象的理解。

關鍵詞：裨治文；《三字經》；改寫理論；蒙學

一、引言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是美國首位來華傳教士，他不僅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占據這開創性的重要地位，同時他的翻譯活動也為美國漢學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他在中國主持創辦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傳教士在中國境內發行的傳播範圍最廣且最具影響力的英文刊物之一。該刊在發行期間，發行範圍覆蓋了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面嚮中國、歐美及東南亞的讀者群體。裨治文主張依靠自身體驗與實地考察來搜集資料，並以不帶偏見的態度傳遞信息，力求客觀、翔實地報道中國^①。這類帶有事實性和中立性的敘述，使西方世界更好地認識中國，起到了『開文學之路，除兩地之坑塹』^②的積極作用。

裨治文于 1835 年在《中國叢報》刊登《三字經》英譯本 *Santsze King, or Trinmetrical Classic*，使《三字經》首次走向美國社會^③，為西方讀者提供了關於中國傳統蒙學教育的重要參考資料。因其擔任《中國叢報》主編而獲得的『象徵資本』，以及該刊所積累的『文化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三字經》譯本的權威性^④。儘管馬禮遜是最早將《三字經》譯介至英語世界的傳教士，但裨治文的譯本在 19 世紀西方學界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學術影響，引起了西方學者對這部中國蒙學經典的關注。

裨治文的《三字經》譯本，既客觀呈現了這部中國蒙學典籍的原貌，又通過譯文的選詞與注釋融入自身對儒家價值體系的認知與判斷。儘管他強調『客觀化』，但其在實際翻譯中仍受到意識形態、贊助人以及詩學的操縱，使得譯文偏離原文，致使儒家核心思想被弱化和誤讀。

二、《三字經》的外傳歷史與裨治文的翻譯動因

《三字經》作為在中國傳統啟蒙教育的經典讀本，在歷代童蒙教材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它與《千字文》，《百家姓》齊名，合稱『三百千』。它凝煉了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及儒家核心思想，被譽為『袖裏通鑑綱目』『千古一奇書』。

《三字經》的外傳歷史悠久。據學者推測，《三字經》在南宋末年就已傳入日本。在日本江戶時期大為流佈，成為當時在日本較有影響力的中國啟蒙讀物^⑤。1741 年，俄國漢學第一人羅索欣將《三字經》待會彼得堡。在 19 世紀，《三字經》在俄國已有四個不同的譯本，最著名的是 1829 年出版的俾丘林譯本。此譯本的問世引發了俄國多家報刊的關注，並得到了評述和推薦。學術文學半月刊《莫斯科電訊》認為《三字經》傳達出了東方哲學之樸素中的『華麗』，半月刊《雅典娜》認為其蘊含了『東方智慧』，《文學報》大力推薦其中的家庭教育理念^⑥。1812 年，英國倫敦出版了由馬禮遜編譯的《中國通俗文學譯文集》，使得收錄在其中的《三字經》得以在英語世界傳播。1835 年，裨治文的《三字經》英譯本刊登于《中國叢報》，使其在美國得到關注。然而由於中西方文化交流匱乏，《三字經》在西方世界並未獲得一致認可。英國《每月評論》對馬禮遜譯介的《三字經》和《大學》作出了頗具批評性的評價，稱其『孩子氣十足；空洞無物』^⑦。美國的評價也多負面，認為此兒童讀物充斥著對孔子的過度崇拜，無法『逗樂或教導孩子』^⑧。隨著對中華文化理解的深入，西方學者逐

漸關注其在兒童道德的啓蒙方面的功能及影響。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三字經》因其道德教育價值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注。特別是1990年由新加坡推出的《三字經》英譯版本,已被報道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教育叢書,成為國際推廣的傳統啓蒙讀物之一。

裨治文是19世紀向西方介紹中國教育最重要的譯者之一,同時也是用功最深,影響最大者。從裨治文翻譯的中國教育典籍中可以看出,他在翻譯選材上明顯傾向於蒙學類讀物。在1835年至1838年間,他先後譯介了《三字經》、《千字文》、《豎韻幼學詩帖》、《孝經》和《小學》等具有代表性的啓蒙教材,同時還撰文介紹《百家姓考略》。

裨治文之所以傾向於翻譯中國啓蒙教材,是受到了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晚清教育環境的影響。裨治文成長於美國第二次新教復興運動的興起年代,此時期思想特徵源於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等人的神學理念,即在保持宗教信仰的同時,重視理性思考。據鄧聯健先生研究,薩繆爾·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知識拯救力量』的觀念對裨治文產生了直接影響,在此思想影響下,他將知識傳播作為傳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⑨。在裨治文來到中國後,他發現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對中國社會影響極大。作為官方考試科目的四書五經,讓知識階層注重玄想而輕視實用。儒家文化所強調的重『道』輕『器』、重『義』輕『利』的風氣也流傳在民間。裨治文反對這樣的風氣,他認為中國教育思想停滯不前的原因在於,人們在思想和行為上都向過去尋找優秀的東西^⑩,『學生們不僅書寫2000多年前已經使用的文字,就連學習的內容也是2000多年前的學者的那些規訓、法則和箴言,在這裏,無論是知道日常行為的名言警句,還是政府之路原則,都是陳陳相因的產物。』^⑪,同時,裨治文發現『……所有中國青年背誦的這些教條許多是用古文言精心修飾的,因為沒有注釋,只能是一知半解,但還是能夠被理解並經教會在腦海裏留下持久的印象。每個學童都學習孔夫子的金科玉律,而且在後天也不允許自己懷疑。』他由此總結,這就是『道德普遍敗壞的源泉,並由此而滋生出來的對所有嚴肅宗教極度的冷漠』^⑫。他意識到,要讓象徵『光明』的基督福音深入中國社會,就必須先瞭解並分析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從中揭示其思想的局限,以此凸顯基督教的優越性。裨治文此後的傳教活動也表明,知識傳播與教育成為其工作核心。他在《中國叢報》多卷導言中將『知識』作為核心議題,還著重論述知識傳播與社會發展的關係。他頻繁使用『交流』、『傳播』等詞來描述知識流動,文章中也多使用『道德和宗教』、『科學和神聖的真理』等概念組合,並將知識傳播與國家發展狀態相掛鈎,認為知識的有效傳播能夠推動社會變革^⑬。為踐行自己的想法,他於1834年建立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1836年創辦馬禮遜教育會。當美部會秘書長致信質疑裨治文的教育事業和基督教無關時,他回信稱『教育乃是讓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的最主要手段之一』^⑭。可見裨治文的譯介動因,也證明他並不認為科學和世俗的知識會妨礙信仰,而是連接信仰的橋梁。

《三字經》的海外傳播不僅體現了其作為中國典籍所具有的人類共有的價值認同,也折射出文化語境差異所出現的分歧。裨治文的翻譯動因更是呈現出改寫理論所指出的:翻譯並非對原本的完全客觀呈現,而是在譯者的文化背景與認知框架下的再創造。雖然裨治文多次強調應『客觀地報道中國』,但他也不可避免地帶著固有的文化觀念和預設進入翻譯過程。其《三字經》譯本正是這種文化觀念介入的產物,在傳遞中國教育理念和儒家文化的同时,也通過翻譯策略反映出特定的西方文化取向與基督教價值的訴求。

三、裨治文於《三字經》中的改寫

改寫理論(Rewriting theory)由安德烈·阿爾方思·勒菲弗爾(André Alphons Lefevere, 1946–1996)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他認為翻譯在本質上是對原作的操縱與改寫。這種操縱和改寫受特定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因素影響^⑮。因此,翻譯研究不能局限於語言層面的轉換,而應當將其放置於更廣闊的社會文化

語境中進行考察。勒菲弗爾指出，翻譯文學系統受到外部的贊助力量和內部專業人士的雙重操控。贊助人可以是政府、宗教團體、出版機構等，他們通過經濟支持、意識形態干預和社會認可影響翻譯。文學傳統、創作技法和文學職能等詩學核心要素由專業人士（如評論家、教師、出版商等）掌控，他們基於特定歷史階段的審美規範對作品文學進行價值評估，通過『經典化』或『邊緣化』的評判機制確立作品在文學譜系中的定位。可見，譯者在翻譯時做不到完全的客觀，追求可觀的裨治文在翻譯《三字經》時，也不可避免受到這三因素的操縱。

首先，《中國叢報》的創辦離不開美部會和外商等贊助人的影響。在裨治文來中國之前，馬禮遜等傳教士在華傳教屢屢受挫後，萌生了在中國創辦英文刊物的想法。他認為這樣『不僅能夠激起人們對傳教活動的廣泛興趣與支持，還能為傳教士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¹⁰。因此，馬禮遜向美部會求助，他向美國教會申請財務和人力支持以籌建出版機構。裨治文就在美部會派遣下赴華協助馬禮遜，並受美部會的指示：『在你所有的工作中，首要目標實在中國人中傳福音。……在你的工作和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向我們報告這個民族的性別、習俗、禮儀，特別是他們的宗教如何影響了這些方面，向公理會差會部做出完整的報告』¹¹，因此，裨治文受贊助人美部會影響，匯集各類與中國相關的信息刊登在《中國叢報》上，並以此推進教會事業發展，完成美部會任務。在創刊當天，裨治文在日記中也闡明了其辦刊動機：『但願它完完全全是由上帝的作品，從誕生之日起，在它的整個成長過程中，都是如此；願他的每一頁都充滿了真理，宣揚上帝的榮耀，增加其子民的德與善』¹²。除美部會的贊助外，受清朝嚴苛管制而倍感困擾的在華西方商人為了利益也積極投身於《中國叢報》的創辦。裨治文等人以『認識中國、瞭解中國、研究中國』為宗旨的創報理念，讓他們意識到『傳教士是最有力的同盟者』¹³，而《中國叢報》也不失所望，為『外商提供了各個領域的相關資料』¹⁴。由此可見，裨治文等傳教士在創刊動機和材料選擇都受到贊助人的約束。

其次，裨治文在詩學層面對《三字經》的改寫，主要體現在格式以及翻譯策略的選擇方面。裨治文在譯文前添加導言，並在後文附上注釋。通過在導言部分對《三字經》主題進行介紹，為西方讀者閱讀理解該蒙學典籍的主題提供了便利。由於中文著作的表述特點和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存在較大差異，如何讓在翻譯中兼顧二者是翻譯過程中的一大難題。裨治文也指出中西書籍的排版不同：『中國的書籍和希伯來書籍一樣始自右方，但文字並非自右向左橫排，而是自上而下豎排』¹⁵，如果完全按照《三字經》原文的排版格式進行翻譯，會讓翻譯工作和閱讀難度上升，因此，他將原文本的自上而下的排版格式，改為自左向右。此外，在翻譯策略上，裨治文采用直譯。力求在詞匯與句式上保留原文淺顯易懂的風格，裨治文也在譯文的導言部分寫道：『我們保留了原文的對仗句式，但沒有嘗試使譯文符合韻律』¹⁶。為使西方讀者更容易把握文本內容，他利用原著各短句之間的內在邏輯連貫性，將其連綴展開為西方讀者所習慣接受的記敘型文體¹⁷。然而，這樣的翻譯策略也帶來了一定的局限性，它難以完全闡釋中國典籍的豐富內涵，從而導致西方讀者對中國儒家經典產生誤解，甚至低估其思想深度，進而從根本上否定儒家學說，並以此來呼籲傳教士所提出的改革中國基礎教育的主張¹⁸。

最後，裨治文在譯文后的評論中體現了其基督教意識形態。裨治文在實際翻譯過程中力求客觀呈現晚清教育狀況，保留了蒙學教材的原始面貌，修正了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存在的認知偏差。但是澳洲學者伊麗莎白·馬爾科姆(Elizabeth L. Malcolm)和美國學者保羅·哈里斯(Paul W. Harris)都認為，雖然《中國叢報》自我宣稱其內容公平、客觀，但因為受創刊者、撰稿人和贊助人的影響，它的創辦和經營不可避免帶著目標和預設，甚至偏見和誤解¹⁹。其先入為主的思想觀念，還是避免不了傳教士們帶著基督教色彩的眼鏡來評價中國典籍。在《三字經》導言中，裨治文一方面強調對中國的情況『只能如實記錄』，另一方面又坦言『我們是帶著特殊情感來做此事的』²⁰。此外，在《三字經》的注釋部分，裨治文更是對其基督教立場不加掩飾。他批評《三字經》欠缺神學層面的意義和宗教性的關懷：『該書雖然風格清晰、語言純正，但道德情操和信仰準

則方面的內容十分欠缺,……書中對天父、造物主、萬物之主宰完全不着一字,學子們只能在一片漆黑之中摸索通向永恆之路。』²²然而,裨治文並不是只對《三字經》有這樣的批評。在《中國叢報》創刊號的『導言』中,他已流露出對中國文化和典籍的偏見:『……更不奢望在中華帝國汗牛充棟的文獻中能發現價值和權威足以撼動《聖經》地位的作品。』²³可見,裨治文站在基督教立場,將《聖經》作為評判中國典籍價值的唯一標準,忽略了中國典籍的價值。

勒菲弗爾指出,任何翻譯行為都必然發生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之中,當兩種語言體系及其背後的文學相互接觸時,譯者實際上承擔著文化中介的重要角色,其翻譯活動必然帶著主觀傾向,難以保持絕對中立。裨治文在意識形態的操縱下,對《三字經》內容進行了改寫,可以明顯看到他對中國文化內涵有意或無意的忽略。比如,他將翻譯『孝於親』和『弟於長』分別翻譯為『duty to parents』和『duty to elders』。用『duty』將『孝』與『弟』的內涵轉化為表面對父母長輩的責任感,大大弱化了儒家『孝悌』中的情感維度二號深層文化含義。這樣的改寫,可以看出裨治文深受西方倫理的影響,尤其是基督教道德中的個人主義和對責任的強調。反觀為傳播中國語言、文學和文化努力的著名漢學家翟里斯,他在參考裨治文版本的《三字經》、瞭解中國文化後,他自己著手翻譯《三字經》。他將『孝』與『弟』分別翻譯為,『filial piety』和『fraternal love』。這一譯法淡化了其中作為社會普遍責任的倫理色彩,凸顯了中國儒家『孝悌』觀念中的血緣聯繫。又比如《三字經》中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部分:『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數。』裨治文將『本乎數』譯為『the sources of all classification』,強調五行作為分類來源的功能性,弱化了五行學說所強調五種元素的動態生成和相生相剋的過程,同時也忽略了天地自然之理數是五行的根本來源。翟里斯則將『本乎數』譯為『origin in number』,展現並強調五行數理的根源。從兩位譯者的對比來看,裨治文在翻譯時顯然受到西方本體論對於追求永恆實體觀念的影響。裨治文的改寫,大大弱化了中國儒家和中國哲學思想的內涵和價值。

裨治文對《三字經》的誤讀和改寫,也受到了中國國內一些學者的批評。在寧博和李海軍看來,裨治文對《三字經》的誤讀和不當的闡釋,弱化甚至是貶低了《三字經》在中國經典中的重要地位²⁴。在鄧聯健看來,裨治文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用有色眼鏡看待中國教育,使得中國教育的先賢人物、經典教材、思想根基,在一個充滿宗教偏見的譯介者筆下成為不堪一擊的犧牲品²⁵。裨治文以近代西方文明為衡量其他文明的唯一標準的思維方式,致使他在觀察、認識中國時,以非此即彼的簡單化思維方式,從西方文明的發展模式出發,否認中國文明自身發展的獨特性,忽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價值和實用價值。

四、裨治文改寫的建構意義

裨治文對《三字經》的翻譯與改寫,受到宗教立場、贊助人與詩學的多重影響。在這交錯的背景下,裨治文的改寫呈現出複雜的建構意義。他不僅參與了中國形象的重塑,也在無形之中推動了中西文化的互動與知識交流。

(一) 贊助人與意識形態下的改寫:中國形象的塑造

從《中國叢報》的創刊到發行,美部會扮演著一個特殊角色。它既是贊助人又是影響裨治文立場的意識形態源頭。一方面,裨治文受美部會指示如實報告中國情況,糾正前人對中國形象的誇大和醜化,將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呈現出來;另一方面,美部會的贊助和基督教立場,使得裨治文所有的翻譯活動必須迎合傳教這一目標,導致其對中國蒙學經典的改寫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視角,對中國形象也有著變形扭曲的一面,影響了西方對中國文化和形象的認知和構建。

公元前5世紀至17世紀,中國在西方國家眼中是烏托邦式的,是一個遙遠、象徵著財富與王權的國家。

然而到了 18 世紀中後期，中國形象出現逆轉。這樣的轉變不是突然，在 16 世紀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中，中國形象已有著逆轉的趨勢。雖然在門多薩筆下，中國的形象在書中大部分內容還是烏托邦式的，但是他又在個別章節中稱『中國人現在依然處於盲目的偶像崇拜狀態……顯示出他們的愚昧和對上帝不敬。這也不難理解，因為他們並沒有受到基督教真理的洗禮，喪失了敬畏和理性。』又稱『如果沒有上帝的恩澤，他們也無法修正自己的錯誤認知』^③。可見《大中華帝國史》的書寫意圖恰恰在於，說服讀者相信在中國這一遙遠的異質文明進行佈道具有極大的可能性。最終，前往中國並推廣福音的理念在共情效應中被大眾讀者自律性接受和被強化了^②。那麼，19 世紀來華傳教士試圖將中國描繪成一個因缺乏基督教真理，而深陷蒙昧黑暗的國家的做法也就有跡可循了。

澳洲學者伊麗莎白·馬爾科姆(Elizabeth L. Malcolm)也道破《中國叢報》的實際目的是為了『抵消耶穌會所傳達的中國之良好印象，并向西方展示這個國家的墮落本質，以及多麼迫切地需要基督教』^③。傳教士們普遍認為『對中國做出正面評價，將會危及傳教事業的合法性』^④，那麼裨治文對中國蒙學教材的地評價也就不讓人意外了。裨治文通過強調中國教材壓抑人性、『沒有造物主的出現』來體現西方教育和基督教的優越性，以此來合理化來華傳教的目的。他批評《三字經》缺乏神學層面的意義與宗教性的關懷；批評作為中國教育根基的《小學》內容『不完備、不牢固』；批評中國思想家們『從未達到知識的起點水平，渾然不知敬畏上帝』^⑤。《中國叢報》批評儒家思想抑制了中國人的智慧潛力，他們認為中國的教育無法培養孩童們的想象力、藝術性和詩歌意境，取代這些的是『冰冷僵化的繁文縟節、死氣沉沉的循規蹈矩和枯燥乏味的幼稚胡言』^⑥。裨治文和《中國叢報》對中國教育的否定，不僅給西方讀者營造出一個專制、僵化乃至墮落的中國帝國形象，還使得中國被塑造成了一個文化思想底蘊貧乏、急需改革且需要接納上帝知識的形象，以此達到合理化傳教士來華傳福音的目的。

在意識形態操縱下的改寫，不僅影響了西方讀者對儒學的理解，也加深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偏見與誤解，使儒家文化在 19 世紀的西方世界中逐漸被汙名化。

(二) 詩學下的改寫：東學西漸之橋梁

裨治文對《三字經》的改寫不僅僅是簡單的語言轉換，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重構。他不僅調整了文本格式，使其符合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還在部分內容上進行簡化以適應西方認知框架。這種改寫在對內容進行一定程度上的重塑的同時，也使得《三字經》和儒家文化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進入西方世界。

裨治文的《三字經》譯本，不僅在當時引發了西方學者對《三字經》的關注，還成為後續譯者的重要參考，從而推動這部蒙學經典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與再創造。例如，美國漢學家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 1848 年出版的《中國總論》中討論中國基礎教育體系時，直接援引了裨治文的《三字經》疑問作為參考；1861 年，詹金斯(Benjamin Jenkins)重譯《三字經》，還附上裨治文的疑問作為參考；法國學者儒蓮(Stanislas Julien)于 1864 年出版的《三字經》英漢對照本也參考了裨治文的譯文；1902 年，英美傳教士在上海創辦的《東亞雜志》刊載了裨治文的《三字經》譯文，等等^⑦。可以看出，裨治文的翻譯活動不僅推動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認知，也為推動了漢學研究和跨文化交流。

作為《三字經》傳播載體的《中國叢報》作為近代早期西方瞭解中國的主要窗口，它的開創性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其中刊載的中國典籍譯作，不僅為當時的西方讀者提供了接觸中國文化的渠道，也為後世研究者保存了特定歷史時期中西認知交流的重要文獻。

五、結論

在翻譯過程中，裨治文受到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的影響，對原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寫。在改寫的

背後，顯示出宣揚基督教，削弱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深層意圖。雖然裨治文等傳教士在翻譯中國典籍時存在改寫與誤譯，且不能做到完全客觀，但他們的譯介推動了中西思想的碰撞與交流，影響了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認知。

裨治文的改寫案例啓示我們，翻譯是一項高度複雜的跨文化實踐。講好中國故事，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需要譯者是一位嚴謹的學者，還要是以爲靈活的闡釋者。更重要的是，譯者的詩學能力對傳達原作的詩學效果尤爲重要。詩學能力強的譯者，能够成功再現原作富於文學性的表達方式及其美學效果，從而增強其在譯語讀者中的傳播力與影響力^①。在科技發展迅速的大背景下，通過建構大規模語料庫，使得同一源文本在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個譯本進行用詞對比與可視化分析，從而揭示翻譯策略背後的文化適應模式與意識形態變化。人工智能的出現和發展，加速了這一進程。智能檢索與數據分析工具，幫助譯者更高效地獲取語料，選擇最優表達，從而使那些原本難以傳遞的中國傳統文化概念得以更精準地轉化爲目標語言。這不僅有助於提升翻譯質量，還有利於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化形成更深入、更客觀的理解。

注釋

- ① 馬少傅：《裨治文中國觀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頁44、42。
- 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對西方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一輯）》，中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頁382。
- ③ 寧博、李海軍：《〈中國叢報〉對中國蒙學典籍的譯介》，《武陵學刊》，2016年第6期，頁109。
- ④ 李潔：《〈三字經〉裨治文的兩次譯介行爲考察》，《外國語文研究》，2022年第1期，頁106。
- ⑤ 譚建川：《〈三字經〉在日本的流播與衍變》，《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72。
- ⑥ 伍星宇：《〈三字經〉在俄國》，《學術研究》，2007年第8期，頁113–114。
- ⑦ 劉佳：《從馬禮遜的〈三字經〉和〈大學〉譯本看中國典籍在西方譯介的影響》，《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頁175。
- ⑧ 張濤：《〈中國叢報〉的孔子觀及其向美國的傳播》，《安徽史學》，2016年第1期，頁139。
- ⑨ M. C. Lazich. (1998). E. C. Bridgman and the Coming of the Millennium: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Knowing The Time, Knowing of a Time"-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Millenni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December 6–8,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 2–4.
- ⑩ 馬少傅：《美國早期傳教士中國觀和中國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07年，頁42。
- ⑪ E. C. Bridgman. (1832). Review on the History of Monarchy of China by Alvarez Semedo, *Chinese Repository*, 1(12), p480.
- ⑫ E. C. Bridgman. (1835). Promulgation of the Gosper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3(9), p431.
- ⑬ 鄧聯健：《公允之花與偏狹之果：裨治文譯介晚清基礎教育述論》，《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頁100。
- ⑭ M. C. Lazich. (2000). E. C. Bridgman,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The Edwin Mellen Press, p217.
- ⑮ Lefevere, André. (2010).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⑯ 雷致智，尹文涓（譯）：《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个來革新教傳教士裨治文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版，頁73。
- ⑰ E. J. Bridgman. (1864).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A. D. F. Randolph.
- ⑱ E. J. Bridgman. (1864).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A. D. F. Randolph, p. 74.
- ⑲ Paul Varg. (1958).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America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Princeton University, p. 5.
- ⑳ 喬明順著：《中美關係第一頁——1844年〈望廈條約〉簽訂的前前後後》，社會科學文献出版社，1991版，頁17。

- ㉑ E. C. Bridgman. (1835).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Its form, size, author, object, and style;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3), p. 104.
- ㉒ E. C. Bridgman. (1835).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Its form, size, author, object, and style;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3), p. 104.
- ㉓ 周健、姚暘:《19世紀中期來華西人中文著作譯介活動探析——以〈中國叢報〉為中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年第5期,頁129。
- ㉔ 孫乃榮:《〈中國叢報〉譯介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2019,頁69。
- ㉕ 潘蘇悅:《近百年來對〈中國叢報〉的利用與研究述評》,《都市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頁249。
- ㉖ E. C. Bridgman. (1832).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1), p. 3.
- ㉗ E. C. Bridgman. (1835).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Its form, size, author, object, and style;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3), p. 118.
- ㉘ E. C. Bridgman. (1832).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1), p. 3.
- ㉙ 寧博、李海軍:《早期西方傳教士對中國蒙學典籍的誤讀與闡釋——以裨治文〈三字經〉為例》,《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4期,頁80。
- ㉚ 鄭聯健:《公允之花與偏狹之果:裨治文譯介晚清基礎教育述論》,《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頁107。
- ㉛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86).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sabidas as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esmos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s y otra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p. 23, 32.
- ㉜ 高博:《誤讀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中的共情與教化》,《天津社會科學》,2024年第6期,頁100。
- ㉝ Elizabeth L. Malcolm. (197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1850. *Modern Asian Studies*, 7 (2), p. 166–167.
- ㉞ 鄭聯健:《公允之花與偏狹之果:裨治文譯介晚清基礎教育述論》,《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頁106。
- ㉟ E. C. Bridgman. (1836). *Seaou Heo, or Primary Lesson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5(5), p87.
- ㉛ E. C. Bridgman. (1849). *The Chi-shing Pien Nien-shi K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18), p259.
- ㉜ 李潔:《〈三字經〉裨治文的兩次譯介行為考察》,《外國語文研究》,2022年第1期,頁106。
- ㉝ 張保紅、蔡小鑒:《文學翻譯中的譯者表現力研究》,《外國語文》,2025年第5期,頁94。

(Editors: Derrick MI & JIANG Qing)